



【美】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 著 林毅 译

耶鲁的上帝与人

God and Man at Yale

这本书开启了一项事业和一场运动。



耶鲁的上帝与人

【美】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 著 林毅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耶鲁的上帝与人 / (美) 巴克利著; 林毅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 12

(西方保守主义经典译丛 / 冯克利主编)

ISBN 978 - 7 - 210 - 07374 - 1

I. ①耶… II. ①巴… ②林… III. ①保守主义 - 研究 - 美国
IV. ①D8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958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4 - 2015 - 0216

God and Man at Yale

Copyright © 1986 Regnery Gateway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1977 by William F. Buckley Jr.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Regnery Publishing, Inc.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 - LINK International LLC

(www. ca - link. com)

耶鲁的上帝与人

(美) 巴克利著 林毅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66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21.5 字数:250 千字

ISBN 978 - 7 - 210 - 07374 - 1 定价:49.00 元

赣版权登字—01—2015—69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编:330006 电话:0791 - 86898815

网址:www. jxpph. com

E - mail: jxpph@tom. com web@jxpph. 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冯克利^①

在中国介绍西方保守主义，于今未必是一件能讨好人好事。首先是因为它引起的联想不佳。对于深受进步主义观念影响的读者来说，一提“保守”二字，往往会想到有碍“进步”的旧道统，想到特权和等级秩序，更直白地说，想到抵制变革的“反动势力”。

其次，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对于结构已然相对稳固、运转顺畅的社会来说，或许有很多东西值得保守。但是一个亟待转型的国家，如果好的旧事物留存下来的不多，体制依然处于游移未定的状态，这时人们便更愿意用变革来换取改进。倡导保守者于此不免自作多情，徒言往圣先贤而无“活着的”旧制可以依傍，会因缺乏所谓“建设性”和“前瞻性”而为人所诟病。所以与西方不同，在中国批判激进革命意识形态的人，大多并不以保守主义者自居。

^①冯克利，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著名翻译家。主要译著有《民主新论》《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致命的自负》《论公民》《宪政经济学》《哈耶克文选》《邓小平时代》等；发表论文有《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法学来源》《政治学的史学转向——马基雅维里的现代意义刍议》等三十余篇；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缚：政治思想笔记》和《虽败犹荣的先知》。

这种理解可能没有错，但也忽略了保守主义的另一一些特点。

首先，保守主义虽然尚古，但它本身并不是古董。就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样，保守主义也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思想。人们或许能从近代以前的思想家中找到类似保守主义的言论，如柏克之前的胡克（Richard Hooker, 1554—1600）和巴特勒（Joseph Butler, 1692—1752），但不能据此认为18世纪末之前便已有保守主义，因为那时人们并没有保守主义的自觉。保守主义是与现代世界同步发生的。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一旷世巨变，才使保守主义真正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想和政治势力。它所面对的不但是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且支持变化的观念和推动变化的技术手段，与民族国家的力量相结合，也使其规模与强度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它既清除陈旧的束缚与压迫，也能斩断一切凝聚社会的纽带。保守主义自觉与之对抗的便是“现代性”充满危险的一面，但它本身也是现代思想体系重要的一环。

其次，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保守主义是一种专属于权贵或既得利益的意识形态。其实，保守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在西方便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支持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的普通民众在欧美遍布各地，可见它并没有特定的阶层归属。厌恶频繁的变化乃人类的天性之一，大变革可以为英雄带来快感，但也能给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严重的不适。多数人并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成为政客施展革新大业的舞台。保守主义所要维护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利益，而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模式。在保守主义看来，这种秩序的存在既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也是文明成长的要件。

再次，保守主义多被喻为政治列车的刹车器，讽其抱残守缺，不知进取，缺少“行动能力”。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如此。然而，姑不论阻止变革也需勇气和社会动员，即使从革除时弊的角度看，远有英国保守党

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和丘吉尔，近有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皆表现出强大的行动力，其厉行鼎革的勇气丝毫不让于对手。可见在重新为社会定向的问题上，保守主义思想同样可以提供强大的动力来源。在国际关系领域更不待言，欧美的保守主义者通常比其他政党持更强硬的立场，更加倾向于“行动主义”。

不过，以上所述只涉及保守主义的形式特点。如果观察保守主义的思想内容，则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条理清晰的体系，而是有着十分复杂的成分。即以保守主义鼻祖柏克来说，他向不以理论家自居，其思想缺乏严谨一致的外表，法国的迈斯特与他相比，基督教宿命主义的倾向就要清晰得多。英美保守主义因柏克的缘故而与古典自由主义和法治传统结下不解之缘，同样受柏克影响的德国保守主义，则呈现出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情。在19世纪，黑格尔是普鲁士国家主义的辩护士，法国的贡斯当和托克维尔则为现代商业文明和民主趋势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后的保守主义思想同样成分复杂，有些甚至相互冲突。例如，同为德语文化圈的哈耶克和卡尔·施米特，大概除了可以共享保守主义之名外，两人的思想甚少相似之处。在英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中，奥克肖特的思想很世俗化，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却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保守主义者在美国通常是小政府和地方主义的支持者，在法国则多是中央集权派。在经济学领域，政治光谱中偏保守的人多为市场至上派，但很多文化保守主义者对经济自由带来的物质主义有很大保留。施特劳斯对现代资本主义嗤之以鼻，可是在安·兰德看来，它是西方文明最珍贵的成果。有些保守主义者常常表现出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倾向，但也有不少保守主义者依然信守由基督教传统中演化出的普世主义。

所有这些难免给人一种印象，保守主义是一个混乱的概念。就如同

哈耶克和亨廷顿所说，对于应当保守者为何，保守主义者并无统一的目标。它缺少清晰稳定的政治取向，因此不能提供一种实质性的理想。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思想色彩各不相同的人都愿意用“保守主义”自我或互相标榜，至少说明了它具有强大的工具性价值。保守主义本身可能无力提供一种完备的替代方案，但对于维护社会中某些既有的结构性成分，或避免某些政治方案的恶果，它却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种工具角度来理解保守主义，使它与其他政治学说相比，拥有更多守护原则的实践技艺。所谓“道不自器，与之圆方”，它可以为变革与连续性之间的平衡提供一定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守主义不是政治哲学，而是一种古典意义上的“政策”理论；它不是无视现实的传统主义或文化原教旨主义，而是现实政治和伦理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保守主义虽然谈不上是一种严整的思想体系，勉强给出清晰的定义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但还是可以为它归纳出一些基本特征。作为一个复杂的思想群体，这些特征不是表现在他们的共同主张上，而更多的是反映在他们的共同反对上。

第一，大体而言，保守主义者对于以现代技术理性为基础的进步主义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进步有无可争议的正面价值，认为眼前的经验并不足以人的正确行为提供足够信息。无论观念还是技术革新给生活方式造成的改变，其长远后果不是立刻就能看清楚，所以保守主义者都反对激进变革，对历史和信仰的传统持虔诚的敬畏态度。

第二，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社会不是外在于人类活动的客观事实，可以由人对其任意加以改造。社会最可贵之处，是通过特定群体长时间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内生秩序，它类似于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其最好的、最自然的变化是演化与生长，这个过程不排除理性的作用，但由于人性

天生并不完美，所以理性在引领变革中最重要的作用是审慎。

第三，社会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家庭伦理、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来维系，它们使人们在生活中感到惬意，形成真正的权威认同。如果这些因素受到破坏，恢复起来将极为困难。因此培育和守护这些因素，乃是维持社会健康的必要条件。

第四，保守主义者对政府权力一向保持戒备，不信任基于权利平等的现代民主政体具有至上价值。他们认为贤能政治（meritocracy）更有益于社会整合和道德风气的培养；肯定基于自然原因的不平等的正面意义。

第五，保守主义还有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特点：它严重依靠历史和传统叙事，认为所谓科学思维提供的各种原理不具有道德和社会优势，因此排斥超越时空的理性批判。这使保守主义文献在话语风格上文学叙述多于逻辑分析，引经据典和释义成分多于体系建构，这也是保守主义缺乏系统性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保守主义诞生二百多年来，相关文献汗牛充栋，由于产生的时代和区域背景不同，各派思想杂陈，良莠不齐，即或择其一支加以系统介绍，亦恐难以办到。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仅仅是着眼于过去西方保守主义在中国相对而言译介不多，如今反思百年革命者众，而对革命回应最有力的西方保守主义传统，却缺乏足够的文献可资借鉴，不免是一件憾事。在就民族未来亟须重建共识的时代，编者愿借这套丛书的出版，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机会，掬他山之水，浇灌我们的智慧。

是为序。

2015年8月20日于济南历山雀巢居

译者的话

自由主义的第二张面孔

当弗朗西斯·福山不无得意地宣称“历史就这样终结，这就是说，这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结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普遍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时，他所发出的并不仅仅是一句无知者无畏的狂言。即使是在冷战的硝烟早已烟消云散的今天，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或许我们还应该为其冠以美国的前缀——也似乎并未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在那些自由主义拥趸们的眼中，尽管在世界的“某些角落”里居然还有着那么“一小撮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狂妄之辈”胆敢对所谓“最符合人类常识”的“真理”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但归根到底，自由主义高歌猛进的“收复失地”运动也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了清扫残敌的收尾阶段，那些顽固拒斥“人类福音”的哀鸣终将无可挽回地成为终曲。然而，假如我们并不满足于欣赏这幅为那些自诩“人类良心”的布道师们所织就的末日审判图卷，而是尝试找回曾经一度遗失的批判向度之时，自由主义神话的画皮难免就要层层剥落了。审视西方自由主义在一个多世纪中所经历的嬗变沉浮史，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认为它的理论与实践形态早已与洛克时代、密尔时代乃至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迥异其趣；而自

由主义所遭遇的诸多批评与挑战也同样堪称审读 20 世纪自由主义发展史必不可少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这些挑战并不总是来自于“异端”阵营，当我们去认真倾听 20 世纪自由主义奏鸣曲时，其实并不难从中觉察出某些来自内部的不谐之声。相对于自由主义所谓理想范式所构成的 20 世纪西方自由主义发展的明线，这条充斥着内外激斗的暗线或许常常被自由主义的拥趸所有意无意地忽略，然而，仅就《耶鲁的上帝与人》这部篇幅不大的译著而言，倘若离开了对于自由主义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另一张面孔——保守主义（它并不是被作为自由主义的对应概念，而是作为自由主义的特殊现实形态而被提出的）特质的考察，大约我们又是很难真正做到闻弦歌而知雅意的。

对于中国理论界而言，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恐怕并不是一个足以令人油然而生高山仰止之感的名字，因为与哈耶克、诺奇克、罗尔斯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师相比，除了偶然见诸涉及美国保守主义的文献，巴克利进入中国学人视野的机遇实在不能算多。也正因为此，当这位被冠以“美国现代保守派运动之父”威名的人物以 83 岁高龄辞世时，似乎并未在远处万里之外的中国学界激起哪怕一丝微澜。然而，假使有人能够稍稍跳出自古以来以立言作为评判人物第一标准的窠臼，转而沿着拉斯韦尔所提出的“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这样一条政治科学基本问题的主线来考察一下巴克利的生平，那么或许我们就会发现，通过终其一生、不懈地游走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地带，这位口含金汤匙降临人世的富二代给美国现实政治所带来的影响，其实是要远远大于学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大师们的。从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一篇未能发出的讲话稿到创办《国家评论》杂志，从主持三十三年的政论电视节目《火

线》到近乎“睚眦必报”地公开激烈回应每一篇质疑自己意见的书信，我们不能不把巴克利那半个多世纪里并不纯粹的学术生涯定义为一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鲜活编年史。任何政治理论的研究最终还要回到实践的土壤中接受检验，仅就这一点而言，难道我们还会认为，那些“不为人知”的巴克利们远不能望及声名显赫的罗尔斯们吗？

事实上，正是在那个几乎已经被人们，尤其是美国学界之外的人们所选择性遗忘的麦卡锡白色恐怖年代里，巴克利这位具有骷髅会员身份的美国精英当仁不让地冲在了“肃清共产主义流毒”的前列，而这部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学术著作的小书也恰恰成为自由主义保守理念的行动宣言书。在其字里行间当中，我们并不难读出冷战时代处于意识形态谱系另一端的“斗士”特有的狂热气质。当然，站在今人的立场上，或许有人会用“时代的烙印”将其一笔带过，然而，当我们认真审读作者这些厉声控诉“混入”耶鲁殿堂中的“反基督异己分子”、面对“邪恶势力”而毫无作为的校董，以至于将矛头直指“背叛”校友信任的耶鲁大学本身的文字时，当我们浏览那份被作者不厌其烦地开列出的所谓使用了“不适当”经济学教材的美国高校“黑名单”时（参见本书附录 G），大概难免会有那么一些“不知趣”的读者会不自觉地产生某些“过度”的联想，乃至对那个由我们连上网络、点击鼠标就能够轻易看到的耶鲁公开课所构成的“自由思想的美好世界”的真实性产生那么一丝不无叛逆的怀疑冲动。其实，揭开自由主义在 20 世纪田园牧歌的温情面纱，人们并不难发现，自由主义的发展史就其本质而言仍然不过是一部精英自说自话的半神话史，而在这部史书的卷册中，那些同巴克利一般洋溢着犹如数百年前十字军骑士一般激情的前台舞者，尽管在其举手投足之

间不免时常给人留下某些不可理喻的印象，然而正是这种近乎“坦率”的表达，无意间揭露了自由主义以捍卫精英自由为第一要务的本质。正如20世纪初欧洲精英民主理论在挑战自由民主理念时所揭露的那样，自由主义的任何价值言说都不过是对精英统治本质的矫饰。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这本书中，巴克利为什么要对于那些在常人看来不过是为现行的资本主义统治体系小修大帮忙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尤其是凯恩斯主义理论与实践，参见本书第二章）不吝讥讽谩骂之词了。当然，无论如何，在译者看来，以巴克利为代表的这些心口如一的贵族多少还是要比那些口头不离自由、平等、博爱三字经的自由主义宗教裁判官们坏得“更真实、更可爱”。与那些学院派的大家相比，巴克利这类“行动中的精英”们，大约从来都不把那种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所谓“纯粹”学术作为其人生行动的志趣。一部《耶鲁的上帝与人》，洋洋洒洒十数万言，通篇之下，能够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恐怕还要算是那些毫无掩饰、甚至是不无粗暴地做出的断句式结论。对于那些多少年来浸淫于“正统范式”中的读者而言，或许不免会有人对此嗤之以鼻。然而，无论我们喜爱与否，也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在现实的政治世界当中，恰恰正是这些可以被视为是“不讲道理”的偏激之词，而不是那些耶鲁公开课上闪烁着“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光辉的名家正论，真正影响到了，甚至是无时不在强力主导着美国现实政治的走向。从20世纪中叶的价值迷失，到世纪之交的“回归原点”，西方自由主义到底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又到底走向了何方，这或许并非一个可以被简单回答的问题。然而，如果寻求答案的目光仅仅被局限在重读自由主义明线上的几部经典时，大约我们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诚然，站在中国学人的立场上，并不会有人认为我们需要以巴克利为榜样，全凭一己好恶而将一切自己不喜欢的观点、意见乃至偏好一概斥之为戕害人心的“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可当我们中的许多人依旧陶醉于享受诸如“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这类弱者自欺欺人的精神鸦片，仍然不吝以最大的善意来揣度西方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异端”居高临下的俯视之时，《耶鲁的上帝与人》这颗20世纪自由主义阴影之树上结出的奇异之果或许会让它的品读者们在有意无意中觉出一丝别样的回味。

25 周年纪念版导读

——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这本引发争论的《耶鲁的上帝与人》最初的出版商——亨利·瑞格奈瑞询问我是否愿意为再版提供一篇全新的导读的场景。但当这本书于 1951 年秋天付梓之后的六个月间，我都再也没有打开它的封面。这造成了一个最为可怕的空档期，因而也就要求我在相隔数月之后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来重读自己所写的东西，在此过程中，我有时需要检校那些我所记得的用来反驳一位评论家对于此书演绎诠释的内容，有时又需要在某些观点讨论中宽慰自己。由此看来，为了写作以下这篇再版导读，而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重读这本书的前景恐怕是并不让我感到快意的。

即便如此，我的不情愿很大程度上还是应该归咎于语言风格方面的理由。当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年仅 24 岁，刚刚结婚，正居住在纽黑文郊区，并且承担着耶鲁大学一门西班牙语入门课程的教学

工作。当时，我得到了来自于弗兰克·乔多洛夫^①——一位温和年长的无政府主义者显而易见的帮助，也收获了来自于艾尔伯特·杰伊·诺克^②——一位时事评论家、编辑、学院际个人主义协会^③的创立者，优秀的随笔作家的友谊与启示，后者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不断地复述强调一个人之所以不信任国家行为的一切理由。同时，我还得到了

①弗兰克·乔多洛夫（Frank Chodorov，1887—1966），思想家，属于老右派一个自由意志主义团体。在外交政策上持不干涉主义态度（反对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政方面则反对罗斯福新政。1937年，乔多洛夫成为纽约的亨利·乔治社会科学学院的负责人。他在那里（和威尔·里斯纳）创办了一份叫作《自由人》的校刊并担任编辑，刊登当时右派的领袖人物的文章。1953年，乔多洛夫建立了个人主义者学院联合会，本书作者小威廉·巴克利担任主席，乔多洛夫对许多后来领导自由意志主义和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人物产生了很大影响。——译者注

②艾尔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1870—1945），颇有影响力的美国自由意志主义作家、教育理论家、二十世纪早期和中叶的社会评论家。诺克自称为哲学无政府主义者，他理想中的社会是一个彻底不受政治性国家影响的社会。他把国家描述成“垄断犯罪的机构”。他反对中央集权、政府监管、所得税，还有强制性的教育，以及其他种种他认为是社会退化的做法。他谴责所有形式的极权主义，包括“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共产主义”，认为所有这些极权主义的性质都一样恶劣，不过他也毫不留情地批判民主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诺克一直是罗斯福新政最坚持不懈的批评者之一。诺克也强烈反对战争和他所说的美国政府的侵略性外交政策。诺克的保守主义社会观在冷战时期帮助了古典保守主义运动的崛起，以对抗当时出现的新保守主义。诺克一直认为国家本身是罪恶之源，他的思想是无政府资本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译者注

③1953年由乔多洛夫倡导成立学院际个人主义者协会（Intercollegiate Society of Individualist，ISI）。它是较早出现的学院际社会主义者协会（Intercollegiate Society of Socialists）的对立物。若干年以后，ISI颇有影响，成为年轻的自由意志论者的联络中心、保守主义刊物的交换所和保守知识分子运动的协调者。——译者注

来自于威尔摩尔·肯达尔^①——耶鲁大学一位教授政治哲学课程的终身副教授的帮助。为军队智库工作的肯达尔教授当时正在华盛顿休假（他曾经这样说过：“每次我向耶鲁大学请求休假时，我都发现学校表现得十分乐于配合。”）

肯达尔先生曾经对当时还是一名在校生的我施加了极大的影响。当然，他毫无疑问是一名保守主义者，但他总是给人们留下保守主义者印象的原因，其实还在于他处于自由主义者们的包围当中，而如果需要的话，他也会被视为一名旨在挑起社会分裂动乱的革命者。就在那样一个年代里，发生了希斯-钱伯斯案件^②，麦卡锡参议员的名字第一次广为人知，而美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则在曼哈顿的弗利广场上受到指控，并以违反《史密斯法》^③的罪名被判入狱。这项定罪极大地激怒了肯达尔的同事们，他们出于呼吁公开讨论这项暴行对于公民自

①威尔摩尔·肯达尔（Willmoore Kendall，1909—1967），美国的保守主义作家与政治哲学学者。20岁时即在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其第一部专著，在哈佛就读期间，肯达尔成为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并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战后，他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在二战中及战后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工作，1947年来到耶鲁大学，成为本书作者巴克利的老师。——译者注

②1948年，美国副国务卿希斯被污点证人钱伯斯指证为苏联间谍并受到审判。——译者注

③即美国《一九四〇年外侨登记法》。因众议员史密斯（Howard Worth Smith）提出其追加条款而得名。1940年6月获得国会通过。它以防止“颠覆活动”为借口，规定外国人和在外国出生的美国公民必须进行登记；凡以任何方式宣传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者均构成“犯罪”。1951年6月4日，最高法院确认《史密斯法》符合宪法，并以6票对2票的多数维持了对11位美共领导人的定罪。1952年，司法部又判定另外40位美共领袖违反《史密斯法》，并予以监禁。1961年，最高法院又作出确认该法“党籍条款”的裁决，从而危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译者注

由权的践踏的特别目的召开了一次教工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批适当的文章用以宣泄自己的义愤。肯达尔在会上聆听了两个小时后，举手发言，复述了他当天上午与一位皮尔逊学院^①里负责清洁学生套房的有色人种清洁工之间的对话。

“这是真的吗？教授。”——肯达尔惟妙惟肖地模仿着那位清洁工带有俄克拉荷马式的拉长调子的口吻（这种特殊的牛津气质来源于他在英国获得罗德学者奖学金的年代）——“这是真的吗？教授。纽约的人们想要……摧毁美国的敌人吗？”

“的确如此，奥利弗。”威尔摩尔回答道。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把他们关起来呢？”

肯达尔为他的同事们所了解到的洞察力，反映出他具有较之于那场会议开始后他所听到的整个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工发言更多的政治智慧。如此这使得肯达尔在耶鲁大学大获成功，并且在所有场合下都赢得了广泛的亲近。

肯达尔具备了种种的天才，并且在其离世之后，他的声誉仍在不断上升。然而，在我的这本书出版之后没有多久，他就向耶鲁大学提议，那些彼此不兼容的意见所引起的问题，应当通过耶鲁大学所兴高采烈地承诺的那样，通过支付大约 40000 美元购买他的合同的方式得

^①皮尔逊学院（Pierson College）位于纽黑文公园街 261 号（约克街口），是耶鲁大学的 12 个住宿学院中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学生数 503 人）。它创立于 1933 年，得名于耶鲁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亚伯拉罕·皮尔逊（1646—1707）。——译者注